



法源文史

(第五辑)

沽 源 文 史

(内部发行)

5

政协沽源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征集科编印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

历史风云

目 录

我和蒋纬国先生在第一师团任连长二三事	赵 轶 (1)
旧察哈尔时期的张之江、高维岳、刘翼飞、宋哲元	李沛泽 (4)
察哈尔都统张之江将军小传	张宝音 (26)
我的回顾	赵 轶 (31)
日军侵华期间强制推行的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始末	刘汉武 (41)
“七七”事变以后大事概略	杨树萱 (44)
日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统治时期强制推行的五次“施政跃进”情况介绍	刘汉武 (47)

工商经济

沾源清代、民国时期的垦殖	贾福海 白云翔 (49)
对沾源工商业改造的回忆	张德普 (61)
沾源农机一厂盛衰记	韩仲华 (73)
话说沾源的商会	白云翔 (95)
沾源历史上畜牧业发展盛况	白云翔 贾福海 (97)

文物天地

沾源出土古钱解说	屈 岩 (104)
四十年前的平定堡镇	丁桂生 (108)
坝上的一颗灿烂明珠——平定堡镇	李保成 李焕金 (111)
日伪时期宝源简况	屈 岩 (125)

漫话今昔

人物史话

- 山洼里飞出的金凤凰——记沽源人才史
话之一 江文蔚 (127)

文化教育

- 旧中国时期沽源人民生活状况简述 宋应昌 (136)
平定堡镇第二小学 胡进贵 杨婉茹 (144)
沽源县第一个乡干部速成识字班 李恩柱 (148)
冰山梁的传说 王国芳 (150)
沽源县部分地区食俗 韩秀玉 (155)
“东一棵”与“西一棵”的由来 胡学文 (158)
沽源县晋剧团演变简况 韩秀玉 (160)
秃葫芦山的传说 胡学文 (165)
青年湖 徐国椿 (167)
浅谈沽源村名的命名与更换 胡学文 (168)

民情民俗

文史知识

- 浅谈文史资料的特征 杨继先 (171)

我和蒋纬国先生在第一师 团任连长二三事

赵 轼

记得那是 1942 年，我们第一师住陕西潼关，在一次全师官兵集合听 师长李正先 来训话，可这次他来会场不是同付师长或参谋长，而是同一位年青的军人，这军人约二十四、五岁，身体端庄，精神焕发，标准的青年军人仪表。我们站在台下的人都觉的新奇，这是谁揣测不出。我和我连排长韩新才小声说：“这个人真精神，是什么人？”师长走到台上挥手让他上前但并没介绍，这青年军人到台中央向台下举手敬礼，礼毕说：“我蒋纬国。”这时全体官兵才知道他是蒋二公子。但还不知道他来第一师干什么。他先介绍了自己的学历，他是先在美国后又到德国军事学校受训（校名记不清了）学习将近二年，现回国来参加抗战。他在讲话中特别说了一点就是他的德国同学说他回国一定能当将军，他说这是他们对我国军事素质看不起，认为日本一击就失败了，这是蔑视我国军队，我回来要当下级官，锻炼好，好做一个军人，把日本打出我国去，来完成我们军人的使命。散会以后他被派到三团五连任排长，他这个排长与我们不同的是他的宿舍有一部电话机，我们在平时只有营长才有，不久他又提升为连长，他是最快的提升。

说起带兵有些与众不同的，就是他们外出或到团营部去，时间稍长一点，他的士兵必须迎送，但不是全部集合，而是跟前或是在别处看到都参加，并不是很远，这样士兵表现出对他的尊敬爱护。他很爱士兵，谁有病他都很关心，常常

和士兵在一起游戏，很随便、和气、没有架子。但对士兵仪表要求很严，一个扣子不扣，歪戴帽子，随便乱坐都是不行的，也就是坐有坐相站有站相，走路必须端庄。二人以上必须同步，同人说话要有称呼有礼貌，亦就是在任何场合下要以军人要求自己。

他对上级亦是很恭敬的，我看一次团长吴俊乘马到操场时，他见来了，马上跑到马前把马接住后再交给别人，他对他的营长也是这样。在看到我们这些同级军官时很远就举手招呼，到跟前很热情说话，实在看不出他是位公子。

他在一次演习排攻击时，地点在五户张北面周村南面，对一个机枪掩体攻击，动作是不错的，敌情观念是严肃的、认真的，和战场一样。他的士兵动作快而果断，表现出勇敢，而那军人的形态又很突出。演习时最令人意外的是忽然跑来一只狂犬向我们参观人扑来(全师连以上官长)纬国当即命令演习排中一名士兵就地射击，士兵一枪命中。真象是提前准备的一样。

在全师每团抽一个连作刺枪表演，他代表三团，我代表一团，在五户张操场演习，他连是整齐而有力，我们其他三个连不如之。

我师在潼关守河防，河对面风陵渡就是日寇，可以说是前沿阵地，当时形势很不利，一切供应是困难的，就拿部队吃粮都是自己运输加工，他们三团住在东泉店，需原粮麦子要到渭南去运，纬国连派去四人运粮，一去了四五天没有运回，停在渭南车站，原因是，每天的慢车由西安开东泉店是上午三时，那个车是一半坐人一半运货(闷子车)，当车到达渭南时，不是跟车睡觉不开车门，就是站长睡觉不调配装不上，故此耽搁。那一天纬国乘上午八时快车到西安，十点时到渭南，看见他连士兵在车站等车，问他们如何不早回，连上没得吃。士兵说车站不给运，他问哪位站长在指挥车，向

他说一声，给装上，可那位站长态度很硬，双方吵了起来，纬国闻声赶去，他们吵声更大了，士兵说我们连长让你快给运，站长说你们连长是什么东西，他指挥我？这时他正到跟前，就说你的态度不好，为什么骂人？站长说：“骂了怎么样？”纬国又说：“你说连长是什么东西，你看我蒋纬国是什么东西？”这时站长才软了，说了一些好话，当天夜晚装车了事。这就说明他不说他是蒋纬国那吃粮还不知要搁几天才能运来。

关于这些情形他能不能记得，我们军长是韩锡候，师长李正先，付师长吴春涌，团长四人是七字：周环，吴俊、李达、何俊，这些人可能不在的多了，又是小事在他记忆中是不是还记得一点不得而知了，可我对他的形象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旧察哈尔时期的 张之江 高维岳 刘翼飞 宋哲元

李沛泽

民国初年，我国北方的察哈尔、绥远、热河三片地区蒙汉杂居，游牧的蒙族事务多，分别建为三个特别区，沿用清代“都统”职务主持全区军政。特别区的建制与省同，都统相当于省长或督军。北伐以后，全国统一，华北三个特别区以及西南的川边特别区一律改建行省，最高行政大员一律称为省主席，不再称“都统”。

察哈尔特别区的都统署和改省后的省政府都驻在张家口，张家口一向被称为张垣。张家口这个地方是明代中期才开辟出来的居民集中地，原属直隶省万全县管辖。此处在几百年来一直是蒙汉通商要道和货物集散枢纽，生产集中，经济繁荣。自都统署驻扎以来，张家口变成了察哈尔特别区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一切地方事物，都统署多所干预，名义上是万全县的一个区或镇（张家口发展规模大了以后，建为万全县的东区、东二区、县属张家口镇）实际上成了察哈尔都统直接管辖地。

由于习惯上的沿袭，特别区改省后，张家口又被正式称为察哈尔省省会，省会的事务自然要由省政府管理，万全县政府很长时间都驻于离张家口30华里的万全城，对张家口的行政事务很少插手，遇有非插手不可的事，往往发生双重管辖情形，那就得当地乡绅人士出头协商解决。尤其是察哈尔特别区都统驻扎张家口的时期，万全县还是直隶省口北道的一个县，县属张家口区里有察哈尔都统长驻并干预政务，

不光发生双重矛盾，并且还发生省与特别区之间县与道之间的扯皮现象，遇到这种情形往往是各方都不管。张家口这块地方是万全县的一个区也好，一个镇也好，或者是察哈尔都统的一个直管地也好，都未曾有过一个当地的正式政府机构，于是，碰到大事还得当地乡绅人士与当地商民代表会合各方官衙自己解决。这在当时北洋军阀政府时代的行政建制上是个非常滑稽的现象，不在本文记述范围。然而，都统和省主席常驻张家口，他们的优劣都关系着张家口的兴衰。当时的张家口群众对他们都有公正的看法。

北洋军阀政府派到察哈尔的都统，大多数征敛有术，治理无方，既不为国效力，又不为民解忧。曹锟、吴佩孚垮台后，结束了北洋军阀轮流统治的局面，虽然新旧军阀势力依然存在，但是以后来察哈尔担任军政大员的有两位都统和省政府主席，却为察哈尔尤其是在张垣推行了不少新政，为当地群众做了大量有益的事情，在张垣父老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窃以为，这样的军政大员虽然是旧时代的旧官吏，但他们为张垣地方有过建树，他们心目中有过张垣的老百姓，张垣的史册上就应该留下他们的一些片断事迹。

都 统 张 之 江

1924年，冯玉祥将军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吴统治，直系军阀垮台。当年11月，察哈尔特别区都统直系势力的张锡元弃职逃跑，所属直军第四混成旅哗变，公开抢掠焚烧，一夜之间，居民遭尽洗劫，繁华街市被烧得七零八落，到处是残墙焦土。本来，在这年夏季一场特大山洪已经把张垣街市冲了个稀糟，数百年之久的石拱普济桥被拦腰冲断，桥东一带变成一片汪洋。直系军阀光顾混战暴敛，那管商民疾苦，断桥残房尚无法修复，加上一夜的混乱破坏，察区的军事政治中心，蒙汉贸易盛地的张垣被弄的乱七八糟，

简直难以收拾。就在这时，北京段祺瑞执政府特派国民军将领张之江来张垣担任察哈尔特别区都统，收拾张垣灾后残局。

张之江深感困难很多，责任重大，得到冯玉祥将军的具体指示后，很快即率领国民军赶来张垣，首先整顿社会秩序，稳定商民情绪。一举将没有跑脱的哗变乱兵数千人悉数捕获，并将其中上千名罪证明显恶劣的集中枪毙于清水河旁，顿时大快人心。紧接着，国民军官兵出动帮助商民修理房舍铺面，清理水淹、火烧后的现场，积极动员商店继续开业，让商民大众各安生计。很快，社会秩序和商民心情就稳定下来，到旧历年底，历时将近三个月，市面即恢复一片繁荣景象。冯玉祥、张之江和国民军的名声深深印入张垣群众的心里，国民军“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军纪也以实际行动得到张垣各界人士的认可和赞赏。

次年开头，张垣的社会秩序完全恢复正常，即着手筹建清水河的新桥。张之江都统鉴于地方上财力、物力、人力之困难，仅依靠京绥铁路局系统的技术和物质力量，出动国民军官兵参加劳动，没有动员连遭天灾兵祸的当地民众，从1925年3月破土动工，不到一年时间，就在被冲断的普济桥南面建成一座高架钢梁、上下分行的新式大铁桥，因河取名“清河桥”。张之江都统亲自以隶书题桥名制成铜牌悬于大桥两头。此桥经过六十多年，虽遭过敌人的破坏及必要的小改小修，现在仍然坚实雄居于繁华要冲的清水河上，成为张家口的名胜之一。

张垣原无马路，主要的大街也都是河床似的路面，马车行人混杂乱走。1925年初兴建清河桥的同时修筑了边路街直达都统署前的大马路，从此，畜力车和胶轮自动车分道行走，使张垣出现了第一条光滑平坦秩序井然的大马路。接着，又开辟了大河套东口至上堡东河沿南口的长青路，使张

垣南北狭长的街市有了两条南北通衢并行，方便多了。

西北边防督办冯玉祥将军坐镇张垣后，张之江在张垣继任察哈尔都统，对张垣市政建设不遗余力，大境门外加固了西沟护坡拦河坝，杜绝了洪水泛滥冲刷，保护住数百家旅蒙商业及其客栈、货院的安全。在都统署前废弃了的练兵场上建成了“上堡公园，”广植花草树木，遍布楼台亭阁，堆砌玲珑假山，挖成环流小溪，给张垣居民们首创出一个优雅场所，增添了张垣居民们的文化生活乐趣。从公园小溪引伸出来的溪水，顺新筑的大马路东侧长沟内直流到大河套泄洪大渠，再归入清水河。水沟边上排满参天速成乔木，虽在盛夏炎日当头，但马路上落满树荫，并有专人一天两次用溪水泼街，漫步五里长街，细闻潺潺流水，偶感飒飒阵风拂面，十分令人爽快。

那时候，张垣没有街道居民组织，也没有张垣统一的管理机构，一切民间生活繁琐事宜，皆由察哈尔都统直辖的察哈尔警察署的四个分署管理。察哈尔警察署把全张垣划为四个区，每个区设一个分署。以清水河为界，桥东是第一区，第一警察分署驻在桥头的三太爷庙；桥西的堡子里及其周围和南营坊一带是第二区，第二警察分署驻在堡子里的三皇庙；下堡玉带桥迤南大片地区是第三区，第三警察分署驻在深沟街的龙王庙；玉带桥往北直达大境门外的西、正沟是第四区，第四警察分署驻在南观音堂。每个警察分署又在各个区内的街巷设置警察分署派出所及警察分驻所。派出所是警察署的基层组织，办理民间所有琐事的地方，分驻所是为了工作方便让警察们分开住宿的地方，分驻所不办公，但居民有事可以找他们。1925年春，即按警察分署及各派出所的管辖范围，建立了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分署都建立户口登记底册，每个家庭都发了户口簿。从此，张垣有了比较系统的人口、职业、年令等项调查统计依据。按说，张家

口是直隶省口北道万全县的一个区，但这项户口登记管理制度是察哈尔特别区都统署领导下进行的。在张家口始行这个制度时，万全县以及其他各地尚无此事。

与此同时，在张垣也建立了卫生检查管理制度。每个警察分署下都设立专业的清扫队，由“清扫队”（我们现在的清洁工）一天两次清扫大街，并在不冻期一天两次用街旁小沟常流水泼新修筑的马路路面，防止尘土飞扬。还在各条大街小巷中派专业的倒土车，一天两次以摇铃为号，收集各家各户的垃圾废灰等。有了专业的倒土车以后，派专人清除了街巷中多年堆积的陈腐烂土，再不准人们随地倾倒垃圾脏物，违者处罚。这个办法效果很好，不久以后街巷之间便焕然一新了。在大搞清扫的同时，动员群众消灭苍蝇，打死苍蝇由警察分署收买，每打死五十个付给现钱一枚（当时流通的铜元分大枚、小枚两种，一大枚顶两小枚，400小枚兑换一元银币）。如果打死一万苍蝇，包成200小包，即可得到一元银币，因此打者甚多，尤其孩童一天到晚手持拍子打苍蝇。这个方法在灭蝇方面一时效果显著，可惜没有坚持下去，第二年春天分署不再收蝇，也就无人打了。

1925年初夏，还在张垣首建了一个消防队，初建时队员仅十余人，地址设在深沟街东头路南，由察哈尔警察署直辖。由于当时条件，没有自来水，没有机动水车，只备有钩连枪杆、长柄斧等破火道的工具，出现火情只能控制火场，不能迅速扑灭。后来队员发展到数十人，聘请专人训练灭火救人技能。在队员装备上是一律厚帆布制服加戴铜盔，当时看来还是很雄壮的。建消防队的同时，也开展群众性的消防准备工作，所有临街商店门前必备“太平水桶”一两只，平常满贮清水，遇火灭火，无火时用以泼街压土，可算一举两得。

1925年春到1926年夏的短短一年多时间，张之江坐镇张垣除大搞市政建设外，还注意平民的文化教育，特

别是开展平民识字运动抓得又紧又深入。在居民中动员识字的人教文盲，那怕一天识两三个字也行，但不能不学，因为要随时派人检查督导。那时，许多家庭主妇，甚至贫困人家的孩童，根本不上学念书，而且当时教育工作不发达，学校少的可怜，因而遍地文盲。开展平民识字运动便采用入戶、连戶的互教方法。同时，还在街巷里开办“平民识字班，”由官方印刷平民识字课本，从官衙、学校抽人或动员商店人员充当识字班教员，每晚准时开课。识字班还通过课本讲述历史故事、历史人物、大自然现象，很受人们欢迎，除去严寒季节，一到傍晚到处都能听到识字班的各种读书声。

旧张垣是个在手工业生产辅助下的商业城镇，除了国有的铁路、邮政系统，只有一个民办的电灯公司，再无其它什么公私集体大生产形式。1925年春，西北边防督办公署创办了《西北日报》，同时建立了当时设备比较齐全的西北印刷厂，还筹建了制革、缝纫、被服等综合性生产的“复旦工厂”，复旦工厂工人曾多达数百人。张垣开始出现了正规的官营集体生产性工厂，很快培训出不少产业工人，在当地改变了单一的小手工业生产方式。

冯玉祥将军关心平民生活，提倡劳工神圣。都统署即在张垣主要街道建筑了不少“劳工休息所”，一般都是两三间通敞明亮的大厅，备有桌凳、开水，有的还备有报纸、象棋、供市面上来往奔波的人力车工人、搬运工人、流动叫卖小贩以及一些无事干的贫苦劳动者，随时进入休息、避风、躲雨，冬取暖，夏乘凉。当然，这无法彻底从根本解除劳动平民的困难与疾苦，但在当时情况下，这种及时关心，颇使劳动大众满意。

都 统 离 维 岳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吴佩孚的直系垮台，张作霖的奉系

势力大举入关，新起的冯玉祥的国民军在奉系正面进攻和直系残余力量夹击中，不得不退往大西北，奉军即占有了直、鲁、热、察等省区，控制了原北洋军阀的大部分地域。1926年，张作霖进入北京，自任大元帅，调高维岳任察哈尔特别区都统，驻节张家口。

高维岳，辽西锦县人，幼年家贫，敏而好学，立志攻读，甚有成就；成年后，入军队任文职，转而投笔编入行伍，由排长一直升任旅长师长。高学识丰富，颇具才华，深受奉军首领张作霖的赏识，很快成为张的主要将领之一。后来张作霖还亲自加封高维岳为“岳威上将军”，在高的家乡建立碑石，以彰其德。

张家口的人们以为张作霖是拉杆子出身，一提他的奉军好象令人生畏。奉军发迹自东北地区，在发展收编零星武装中难免带入一些粗犷性野的思想和作风。奉军在没有到达张家口以前，确也有些纪律松弛、作风不正的队伍，时有扰民现象，再加上奉军中“妈拉个巴子”那句经常不离口的骂人口头语，张垣人和国民军相处二年后，一听奉军要来，难免产生不安心情。

1926年初秋，高维岳率奉军来到察哈尔，张垣人在和他接触中慢慢观察，很快发现他带来的奉军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他带来的奉军在张垣城乡很少滋生事端，在县镇农村也基本上秋毫无犯，老百姓们很快就改变了对高维岳奉军的看法，和他的奉军安然相处起来。

高维岳的奉军之所以能和百姓安然相处，在于他治军从严，主政从廉。他出身贫寒，深知民间疾苦，居官清政，善知社会利弊。他处处能以身作则，经常深入民间洞察了解微末。他执法严明，处事果断，对贫民百姓不摆架子，对官衙下属和军队士兵要求严厉，遇事不迁就姑息。因此，从1926年初秋到1928年夏末，他任都统二年，虽无显著政绩，

却很受商民爱戴，以至张垣城乡安定、百业皆兴。

张作霖的东北奉军系统具有封建保守意识，不象冯玉祥的西北国民军系统那样富有革新创造进取精神。高维岳率领奉军在张垣市政建设方面虽没有留下什么成就，但对他的前任张之江都统留下的各项市政建设严加保护不遗余力。对新建的上堡公园继续加强管理，不断种花植林、清扫维修，成人们的台球室、网球场，依然是青年们的竞赛处所，铁丝拉成的迷宫、假山当中的洞穴，还是儿童们嬉戏追逐的地方。夏季傍晚，太阳西斜，园内鸟语花香，游人不断。严寒隆冬，大雪覆盖，也有人踏出小径进园内欣赏玉裹冰封奇景。对新筑不久的张垣第一马路，仍按旧规分路行车，夏天清水泼街，冬天及时除雪，保证着路面的整齐、干净和良好的交通秩序。在街巷里也仍按过去的办法，按时收取民间垃圾，不准随便倾倒污土浊物。特别对新建的清河桥，除每天由清扫队打扫外，还重新油刷一次，维护了大桥的风姿光彩。

高维岳还派人把西北军退却时停顿了的复旦工厂加以整顿，恢复了缝纫、制革等生产，改名为“实业工厂”，保证了张垣仅有的一一个官办工厂，也解决了这个厂许多人的失业问题。

张垣原有一个晚清留下的造币厂，当时已无币可造，面临破产，高把此厂改成立电厂。为不影响私营的“华北电灯公司”的营业，让此厂专为官厅机关的公用和全张垣各处夜间公共照明服务，和私营华北电灯公司作了业务上的分工。张垣原无电灯照明路灯，主要街道口点纱罩汽灯，小街小巷只点带玻璃罩的煤油灯，一到晚上，昏昏暗暗。新发电厂发电后，大街上一律安装了电灯，照明了路面，方便了来往的群众。

高维岳可能由于儒将性格，爱好古建筑。张垣的古建筑，庙宇最有代表性。昔日张垣庙多，大部分是明代和前清的遗物，可惜因为历年战乱，损坏残缺严重。高认为不加以

保护，不重新修缮，几百年的建筑将会荡然无存，因而特发出指令，命令察哈尔全区各行各业及各界平民百姓，全力保护所有庙宇的古代建筑，该修的修，该重建的重建，完整无缺的也要油漆彩绘，力求翻新。此令一出，各界响应很快，全区许多古庙都得到保护。随之，都统署发出由高维岳都统签署的布告，明确号召永保庙宇，对损伤破坏者严惩不贷，并在布告上定下保护措施和处罚条文。布告贴于木板，刷上油漆，张挂各庙门前，不论大庙小庙一个庙张挂一份，严令各界人等遵守。同时还特令张垣四个警察分署把检查、保护庙宇列为日常任务。此后，再无人敢对庙宇有糟蹋、破坏行为。象张垣正沟街、大境门里、堡子里鼓楼北、东关街等处的关帝庙，仁寿街的万寿宫，鼓楼东街的天士庙，西城墙底和市圈里的城皇庙，北关街的财神庙，桥东街的三太爷庙，深沟街的马王庙、龙王庙等，都是两进、三进大殿，或者是带跨院、斋堂、大戏台的大庙，经过都统署明令保护后，都由商民各界筹资和善男信女的布施先后不断油漆、彩绘、贴金、粉饰，庙容焕然一新。每修饰一次，开光一次，每次都有一连数天的僧道法会，并连演酬神戏。高维岳这一保护庙宇的硬性措施，不但保护、更新了许多大小古老的庙宇建筑和宗教文化事业，并且还活跃了民间的娱乐气象，丰富了老百姓的文化生活。

高维岳维护张垣社会秩序，重视察哈尔全区的城乡安全，保护商民在旅途的生命财产，下过一番工夫。1927年前后，张家口的旅蒙商业还比较兴旺发达，通往内、外蒙古地区的大道上商贩来往不断。这些商贩在沟通内外贸易，繁荣张垣经济方面起一定的作用。同时，由于口外各地多年贫困落后，民不聊生，有些不法之徒铤而走险，经常打家劫舍，有的成了惯匪，这些匪徒除了到处流窜抢劫杀人外，通往内蒙古大道上的商旅就成了他们掠夺的对象，经常遭受他

们的袭击、轻者丢财，重则丧生。

高维岳对此非常重视，闻有土匪滋扰，立派军队前去搜索、捉拿，检明正身，就地镇压，决不手软，对罪大恶极，民愤难平的惯匪头和杀人强盗，差不多还要押到张垣，审问确凿，处以斩刑，斩后剥下罪犯人头，装入小木笼内，写明犯人的名字、作案地点、罪恶事实，“号令”示众。“号令”一次罪犯人头，旅途或四乡就安定一次，所以，虽觉“号令”人头奇残，还是人人称快。

打击猖獗的土匪除动用军警外，还利用有正义的土匪消灭穷凶极恶的土匪。那时候，坝上草原土匪虽多，但有些不是什么人都抢，什么人都杀，而是专抢称霸乡里、鱼肉贫苦人的恶劣老财，有时还拿抢劫老财的钱物接济贫苦的老百姓。他们遇到商旅也不是横抢乱夺，看见大帮富裕的客商，有时伸手要，有时提出借，绝不无故伤人劫货。看见小型商贩，不要也不抢，而是各走各的路。这类土匪是阔商怕而百姓不怕，最有名的莫过于人称“夜猫张”的张诚德一大股。高维岳看中这种矛盾，于是，把张诚德的队伍编过来，给以粮饷，并委任张诚德为骑兵师长、保安司令等职，张在自由逍遥的游荡生活中，利用官军的名义和实力，凭着自己队伍熟悉土匪行动踪迹特点，所到之处，小匪绝迹，并帮助官军消灭了不少惯匪，有效地维护了乡野的正常生活。

在维护张垣社会秩序方面，对一些戏园子、妓院、茶肆、书场等公共场所，防止坏人起哄闹事，逐日派军警检查。鉴于外阜曾有散兵游勇、地痞流氓常去戏园子找碴打闹，借故砸抢，每场戏都派由军人组成的“督察队”到场坐于特设的“弹压席”内压场。督察队由五六个军人组成，其中一个军官带队，荷枪实弹，全副武装。带队军官手捧一个约三尺高的木质令箭，上写“察哈尔都统高”几个字。这把令箭代表高维岳都统临场镇压，遇有不法军人或民间恶棍闹